DOI:10.16263/j.cnki.23-1071/h.2014.06.007

百年俄罗斯语言学研究范式嬗变*

宁 琦
(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提 要:从俄国十月革命以来,俄罗斯(包括苏联)语言学作为其人文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家政体变化的深刻影响。同时,语言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和语言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主导着语言学方法的嬗变和研究重心的转移。纵观百年间俄罗斯语言学研究,其范式经历了历史比较主义、结构主义和人本主义的转变历程,与西方语言学研究成果交相辉映、殊途同归,共同成为世界语言学研究的宝贵财富。

关键词:范式;历史比较主义;结构主义;人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H0 - 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 0100(2014)06 - 0022 - 5

Hundred-year Paradigm Shift in Russian Linguistic Study

Ning Qi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During the one hundred years from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o the present, the linguistic study in Russia (including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Humanities, has been inevitably and profoundly influenced by the change of regime. Meanwhile, the law of language development and the inner logic of linguistics have played a major part in the change of methodology and the shift of research focus in linguistic studies. Throughout the one hundred years, Russian linguistic study has experienced a paradigm transformation from historical comparative paradigm, through structural linguistics, to humanistic paradigm. The fruits of Russian linguistic studies, along with those of Western linguistic studies, which take a different course, form the valuable wealth of the world's linguistic studies.

Key words: paradigm; 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structuralism; humanism

1 引言

20 世纪至今,苏联和解体后的俄罗斯经历了两次翻天覆地的政体更迭,语言学的发展也毫无例外地受到一系列非常重要的社会历史因素的决定和影响,使俄罗斯(包括苏联)的语言学研究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其发展也经历了非常错综复杂的曲折道路。

在这一段几近百年的语言学发展史中,曾经发生过数次语言学研究的转向,其中比较重大、波及面甚广、具有全球性意义的改变有历史比较主义向结构主义的转变、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及功能主义)的转变以及最近的系统结构主义向人本主义的回归性转变。有语言学家将它们归纳为科学范式的改变。

科学范式概念是美国语言学家库恩于 1962 年提出的。他认为,科学范式是"被所有人所认识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定时期为科学团体提供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范式"(Кун 1977: 17)。这些科学成就是指全部为人所认识的科学观念、理论宗旨、学术成果的集合,因此采用明确的范式可以使研究者不必从最初始的原则开始重新建立整个领域并为每一个引进的概念作出解释(Кун 1977: 10)。这也正是范式理论的独特价值所在。科学范式的发展和变化不仅使人类理论研究成果不断丰富,而且反映出人类知识成果的连续性、继承性和互补性,更是以独特的视角对学术发展的历史进行方法论的概括和总结。

在现代语言学领域目前还没有一个划分范式的统一标准和方法,不同范式的更替构成了语言学史。在语言学的发展过程中,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划分出数量不一的科学范式。俄罗斯语言学家卡拉乌拉夫划分出历史范式、心理范式、系统结构范式和社会范式(Караулов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现当代俄罗斯语言学研究的流变与走向"(05JA740001)的阶段性成果。

1987)。波斯托瓦洛娃划分出内在符号学范式、人类学范式和神人宇宙(先验的)范式(Постовалова 1999)。库布里亚科娃阐述了 4 个主要范式"传统范式、生成范式、认知范式和交际范式。其每一个范式尽管处于不同的相互关系,都是将形式描写元素与功能阐释结合起来……都是一个用于语言描写、解决语言组织化和功能化过程中的重要问题的特殊模型"(Кубрякова 1999: 190)。在晚些时候发表的著作中,库布里亚科娃又谈到认知推理范式(Кубрякова 2004)。

马斯洛娃倾向于划分 3 个科学范式:历史比较范式、系统结构范式和人本主义范式。范式的形成首先要求它能成为所有人文知识的共同范式;其次,它作为科学原理的集合,为学者提供提问的模型,并将问题的解决形成一个具有一定研究程序的集合。如此看来,功能的、交际的、认知的、文本中心的和其他语言研究方法都还没有形成范式,它们任何一个都不能全部满足这些要求,尽管功能研究方法似乎可以获得范式的称号,因为它是一系列人文学科的共同研究方法(Маслова 2008: 6 – 7)。

我们在此采用马斯洛娃对科学范式的划分,因为她的划分与语言学史的发展脉络基本一致,并且与俄罗斯语言学各时期的发展变化特点暗合。

2　历史比较范式与结构主义范式之间的起承转合

在马斯洛娃看来,历史比较范式是整个 19 世纪语言学最为重要的、占有主导地位的范式。同时,它也是第一个语言学科学范式,留给语言学研究最为宝贵的就是比较方法和历史方法。历史比较方法是第一个专门研究语言的方法,此前运用的都只是一般科学的方法,如观察、描写等。正是由于这一专门方法的出现,语言学才成为名符其实的独立的科学。这使语言从不是依据业已系统化和清楚的语言事实形成的关于语言的哲学推理和历史推理中划分出去(Маслова 2008: 7 – 8)。

随着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产生,俄国的逻辑语法学派和心理语言学派在俄国首开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先河,语言比较成为语言材料系统化的手段,而语言研究的历史方法成为重要的研究原则。先于结构主义的青年语法学派和新语法学派与强大的俄国语言学派(以福尔图纳托夫为首的莫斯科语言学派和以博杜恩·德·库尔特内为首的喀山学派)一起将历史比较语言学推向顶峰,并和索绪尔一起努力克服了历史比较语言学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所遭遇的危机,并且为 20 世纪语言学的新方向——结构主义铺平了道路。

范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变化,语言学自身的研究对象、问题和任务也在不断变化。单一范式的局限会随着研究的局限性而日益凸现,对传统范式无法解决的问题的突破为新范式的产生提供可能。一个范式的形成是经过科学论证和普遍认同的,一定是当时最为合理、最有价值的人类认识和知识的总和。因此,范式的废与立不是简单的废止和替代,既可能是一种优化的改变,也可能是对之前范式进行修正的新的方法论,还可能是对现有范式局限性的扬弃。

翻过 19 世纪,语言学研究中出现结构范式,代之以对语言历史感兴趣的是对语言当前状态、共时性的兴趣。与 19 世纪最主要的、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相对于历史比较语言学,描写语言学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并上升到主导地位。在西方的语言学史著述中,普遍认为索绪尔是最为关键的人物。"具有意义的是,在 19 世纪的语言学观念向 20 世纪的语言学转变的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人物,正是那个在莱比锡跟新语法学派的成员学习过以后,又因其对印欧比较语言学做出了一项重要贡献而开始出名的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罗宾斯 1997: 213)

然而索绪尔的结构主义思想在当时的俄国并没有获得这种"如获至宝"的重视,原因在于俄国语言学家在早于索绪尔 40 年的博杜恩·德·库尔特内的著述中就已经获得了许多与索绪尔的语言观类似的观点和看法,并且在博杜恩·德·库尔特内的亲自领导下,先后形成了著名的喀山语言学派和彼得堡语言学派。甚至后人的研究表明,索绪尔与博杜恩·德·库尔特内先后有过数次面对面的接触与交流,索绪尔在讲授《普通语言学教程》这门课程时,是接触过博杜恩·德·库尔特内的著述的。我们无力评价其中的前因后果和彼此联系,但至少有一点可以得到证明:结构主义的思想或者萌芽早在 19 世纪后半期的俄国就已经破土而出,虽不至于坚称索绪尔一定受到了博杜恩·德·库尔特内的影响,但结构主义思想在俄国和西方各循其道、同步发展,已是不容争辩的事实。

索绪尔和博杜恩·德·库尔特内的共同思想原则主要包括:1)语言是一个系统结构体系,该系统中的全部单位都以通用的关系——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联系起来。2)语言是一个与其他符号系统在符号学界限内相关的符号系统。3)严格区分"语言"和"言语"。4)语言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研究——共时角度和历时角度,而且更偏重于共时;静态和动态是语言存在的两种状态。5)研究语言需要使用近似于自然科学的准确方法。关于语言的符号特征、社会属性、共时性的重要性、使语言学接近于自然科学的严谨方法的形成等思想及其他问题在阿米罗娃的《20 世纪语言学史。结构功能语言学(起源、方向、学派)》(Амирова 1999)中都有较为详细的阐述(Маслова 2008: 8 – 9)。

稍晚于博杜恩·德·库尔特内,在 19 世纪的最后 30 年,以莫斯科为地域中心,在杰出的俄国学者福尔图纳托

夫影响下形成了莫斯科语言学派，因为该学派的拥护者对语言所有方面进行研究时追求准确和严谨，依据的是纯语言的（形式的、在语言中实际体现的）事实，也称为形式学派。福尔图纳托夫先于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进行了区分“语言主要是符号的集合，用于在言语中思维和表达思维；此外，语言中还存在用于表达感觉的符号”（Фортунатов 1956：111）。他还进一步强调了语言的符号属性“词对我们的思考而言是已知的符号，因为在思维过程中我们想象这些或那些词时，随之就是该语言中这些词独立的言语语音和语音组合体，但我们此时所思考的并不是这些言语语音，而是借助作为思维符号体现形式的言语语音来思考其他事情”（Фортунатов 1956：111）。凡此种种，俄国语言学发展的内在独立性和独特性一览无余。

1917 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在俄国（1924 年后—苏联）建立起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新形态的国家建设需要，使苏联的语言学研究发生从历史比较语言学向社会语言学方向转变。与此同时，在博杜恩·德·库尔特内、福尔图纳托夫所代表的俄国传统语言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结构主义，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莫斯科语言学派（布拉格学派也延续了它的部分传统）和彼得堡语言学派。苏联语言学以独特方式完成了由历史比较范式向系统结构范式的转变。

3　系统结构主义范式的兴衰

十月革命后到 50 年代初期，与世界语言学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思想没有给革命后的俄国带来特别的影响。苏联语言学界仍循着自己的轨迹向前发展，特别是新生的苏维埃国家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变革给苏联知识界以极大的冲击。当时的文化建设和社会政治需要都为语言学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与实践结合的机会。在 20 年代到 30 年代间四十余个苏联民族有了自己的母语文字，在标准语创建及其理论形成方面所积累的经验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上的国际意义。然而，随着马尔主义思想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持不同学术观点的语言学家受到了残酷的镇压，苏联与国际语言学界一度失去联系。尽管如此，彼得堡语言学派和莫斯科语言学派的语言学家们仍积极投身国家的语言建设，为没有文字的民族创制文字和构造标准语的同时，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思想和与之伴随的语音学和音位学理论等都得到了发展。可以想见，如果能有一个良性的学术环境的话，苏联语言学家的天才设想、真知灼见将会得到更进一步的检验和发展，对世界语言学发展能做出更大的贡献。然而历史没有假设，这一时期的苏联语言学由于马尔主义大行其道而被当成一个怪异的现象。据史料记载，马尔主义的统治于 1950 年终结，斯大林撰文指出，同样的俄语既可以为革命前的资产主义服务，也可以为革命后的共产主义服务，所以语言并不依赖经济基础（Нерознак 2001：386）。马尔主义在其终结之时才引起世界对马尔学说的关注，它带给语言学界更多的是教训和反思，而不是收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国际语言学界合作的日益扩大，苏联语言学家逐渐恢复了和外部世界的联系，开始密切关注西方语言学界的各种新思想、新动向。在普通语言学方面，词典学受到特别重视，与语音学和语法学一道被视为语言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再仅仅是语言描述的一部分。历史比较语言学方面，以前在马尔“语言新学说”理论统治下受到压制的斯拉夫语言研究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苏联学者加姆克列利泽和伊万诺夫的论著的发表，关于印欧语言的发源地、扩散、结构的理论，有可能发生具有深远意义的改变（罗宾斯 1997：225）。

结构主义的危机在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初现端倪，在 60 年代表现得最为尖锐。苏联语言学界就结构主义所展开的争论对确定苏联语言学进一步的发展道路具有原则性的意义。很多苏联语言学家认为，“结构主义的实质不是系统地考察语言，而是通过它的极端形式化否定人本主义语言学”（康德拉绍夫 1985：264）。语言在大多数结构主义者的著作中是一个静态系统，所有不受机械化、形式化处理的东西都被结构主义者排除在语言研究的范围之外。这种立场不能不造成对言语活动中人的因素的忽视，因此以结构方式呈现的语言学开始失去其在人文科学中的立场：语言学逐渐朝着应用语言学方向转变。这就是结构主义追求语言学分析方法准确性的代价。

乔姆斯基给结构主义带来沉重打击，尽管其生成语言学就是在结构范式的框架内诞生的。无视所有结构主义原则，乔姆斯基又回到语言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上来，宣称语言学是“认知心理学的特殊分支”，不遗余力地强调语言活动的创造性，提出了在语言研究过程中考虑“人的因素”的问题。乔姆斯基及其追随者的最重要贡献在于，他们发现了旨在解决大众交际问题的语言学理论新目标。西方语言学界将其称为“乔姆斯基革命”，只是还不够彻底，我们暂且称为结构范式向后结构范式（及功能主义）的转变。在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后结构范式框架内产生了若干新的知识领域：确立了演绎语言学的地位、开始研究作为独立的语言研究领域的句法理论、产生句法语义学、出现对语言知识的内在的、精神的描述的兴趣，这些发现为未来认知语言学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Маслова 2008：9）。

从 50 年代初到苏联解体前，苏联语言学与世界语言学发展同步，经历了上述发展变化。苏联语言学的历史和具体成就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一些西方国家的语

言学家竭力洞悉苏联理论语言学的成果。他们承认，苏联语言学出色地完成并提供了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成果，它们都是以具体的事实材料为基础的。尤其是在 70 年代以后，苏联语言学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激进特点。在乔姆斯基等人的理论影响下，苏联语言学家梅利丘克、若尔科夫斯基、阿普列相等人率先提出，不是句法而是语义决定句子的意思，从而推动了生成语义学在当时苏联的产生与发展。

继乔姆斯基的生成理论之后，新功能主义的理论逐渐形成，整个语言学体系也出现了重新分化和组合。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描写方法、对比方法、历史比较方法和结构方法。特别是结构方法作为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在这一阶段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这一时期，苏联传统语言学研究所取得的新的、突破性的进展就是基于对结构方法的极致运用。大批优秀的语言研究者继承和发扬了俄罗斯优秀的语言学传统，什维多娃、阿普列相等人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代表。从历史传承视角看，许多学派的观点都脱胎于莫斯科语言学派和彼得堡（列宁格勒）语言学派的理论思想，表现出了鲜明的学理继承性。与此同时，各个学派之间的界限在彼此交融与合作中、在对非语言学科研究方法和成果的借鉴接受中变得越来越不清晰，语言学很难凭借单一学科之力、语言学家也已经很难凭借一己之力来完成具有开拓性的理论研究工作，因此学科呈现出联合、交叉乃至融合之势，理论成果呈现出团队成果的特点。

4　人本主义范式的回归与发展

结构主义范式进入一定发展阶段后不可避免地显示出自身的局限性，这迫使研究者的兴趣从认识对象到认识主体的转变，即分析语言中的人和人的语言。研究语言的系统和结构的需要被研究语言能力、在语言中固定下来的世界知识、语言持有者的语言特长等方面的需要代替。正如博杜恩·德·库尔特内所言，“语言只存在于个体的大脑中，只存在于精神之中，只存在于个人或组成该语言社会的个体的心理中”（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э Ⅱ 1963：71）。结构向功能、认知转变的趋势使对语言内部结构的研究和为语言而语言的目的发生本质改变，语言研究视角从语言结构向语义、语用和认知不断转移。最早源自洪堡特的“语言是处在外部现象世界和人的内心世界之间的世界”（Гумбольдт 1992：304）的人本主义思想，经过整整一个世纪，再度回归，体现出人类语言研究范式的螺旋式发展的规律。

而 80 年代中期的苏联，无意间又配合了这场范式革命，存在近七十年的社会制度摇摇欲坠，并在 90 年代初遭遇解体，俄罗斯联邦成为独立的国家。人文学科研究上的禁锢和封闭状态被彻底打破，这种变革也给俄罗斯语言学研究及俄语的使用范围和条件带来了明显的变化。正在此时，斯捷潘诺夫宣称人本主义是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原则（Степанов 1985：15）。人被看成整个世界的标尺，是全人类的和独特的民族文化价值的载体。人本主义作为一种科学范式为俄罗斯语言学家所接受，人成为决定俄罗斯语言学研究对象、任务、方法、价值取向的坐标中心。在使用这种方法的条件下，“所言及的人不再是消极的语言表达的所指对象，而是其积极解释者，不再是简单的语言持有者，而是一定思想系统的载体，人以该系统为基础理解语言、认识世界，并与其他语言持有者进行交际”（Павиленис 1983：259－260）。

如果系统结构范式研究的主要是语言的内核、中心，那么现在俄罗斯语言学家已将注意力转移到它的外围，转移到不同科学知识领域的联系，转移到语言学与认知学、心理学、文化学和民族学等的对接（Воркачев 2001）。人本主义的语言观使语言学研究的范围扩大，并在语言学领域形成若干新的方向，除认知语言学外，还有心理语言学、民族语言学、语言文化学和应用语言学。而博杜恩·德·库尔特内似乎早就预见到这一时刻的到来“语言的概括将覆盖越来越广阔的范围并且使语言学与其他科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生物学结合得越发紧密”（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э Ⅱ，1963：18）。

人本主义研究原则的特殊之处在于，“首先根据科学研究对象对人的作用、对人的生命活动的意义、对人的个性发展及其完善的功能来对其进行研究。人本主义体现在人成为分析不同现象的标准，并被纳入这个分析，决定未来前景和终极目的”（Кубрякова 1995：212）。从人本主义的立场出发，人通过对自我的认识、对自己在世界中的理论和物质活动的认识来认识世界，人被置于首要地位，而语言成为人重要的确定特征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Маслова 2008：10－12）。

90 年代后的俄罗斯语言学界更加注重与世界语言学界对话，与世界语言学理论水平接轨，从原来的批判转变为引进和借鉴，并全力输出以俄语为研究语料的理论语言学研究成果。主要借助哲学、逻辑学、认知学、文化学、民族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从不同角度重新审视和研究语言的生成和发展；发挥本土语言学传统的优势，并时刻关注国外语言学研究的新进展、新动向，将西方主流语言学理论与俄罗斯语言学思想传统相结合，重塑和革新自己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论原则。

尤为可喜的是，俄罗斯语言学研究的核心课题逐渐与世界语言学界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趋同，而且原创性成果具有浓郁的俄罗斯特色。事实上，即便在结构主义风行世界之时，苏联语言学家也依然恪守传统，努力记录语言事实，而且尽力解释这些事实，从中寻找语言与人、语言与思维、语言与社会、语言与历史、语言与文化等问

题的答案。他们认为，结构主义因其极端的形式化将造成对言语活动中人的因素的忽视并丧失其在人文科学中的立场，因此语言学不能被视为与自然科学和精确科学类似的科学。基于这样清醒的认识，苏联语言学家以及之后的俄罗斯语言学家始终将语言研究置于广阔而独特的俄罗斯社会文化背景之下。以列昂季耶夫为代表的莫斯科心理语言学派把语言定义为人类活动框架范围内的交际手段，将自己的理论体系称为“言语活动理论”，由于该理论深深地根植于俄罗斯的文化传统、科学成就，因此以其独特的历史渊源、理论基础、发展脉络成为世界心理语言学中的一个独特学派。阿鲁玖诺娃等人的研究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其研究从文本到意义、从语言规范到悖异现象、从话语的逻辑结构到话语的语体特性、从语言的普遍性到语言的民族独特性，深刻凸显出语言与人的世界之间的关系。可以毫不讳言地说，目前俄罗斯语言学理论研究与西方语言学理论研究水平已经十分接近或趋于同步，有些方面甚至已经处于领先地位。

5　结束语

俄罗斯（包括苏联）语言学从十月革命起至今在几近百年的历史中，经历了与国家命运转折关头相伴随、与世界语言学研究范式的转变相一致的变化与发展。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其研究范式的转变尽管与世界语言学研究范式保持一致，但其内在的逻辑性、规律性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和独立性，与西方语言学处于并行不悖的发展状态，而且很多时候甚至比西方语言学研究还要先行半步，处于前沿引领地位，是世界语言学研究不可分割的宝贵财富。遗憾的是，这一点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逐步改变这种状况，以俄罗斯语言学研究成果来弥补我国语言学界研究中存在的理论来源的不足，充实国内语言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拓宽语言学理论研究的视野，推动语言学研究的多元化发展。

参考文献

康德拉绍夫. 语言学说史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

罗宾斯. 简明语言学史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Амирова Т. А. Из истории лингвистики XX века. Структурно-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истоки，направления，школы）[M]. М.: Черо，1999.

Арутюнова Н. Д. Язык и мир человека [M]. М.: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1998.

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э И. А.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по общему языкознанию. Т. II [C]. М.: Изд-во АН СССР，1963.

Воркачев С. Г. 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языковая личность，концепт: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антропоцентрической парадигмы в языкознании [J].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ая наука，2001(1).

Гумбольдт В.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по языкознанию [M]. М.: Прогресс，1992.

Караулов Ю. Н.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и языковая личность [M]. М.: Наука，1987.

Кубрякова Е. С. Эволюция линвистических идей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X века [A]. Язык и наука конца 20 века [C]. М.: Ин-т языкознания РАН，1995.

Кубрякова Е. С. Семантика в когнитивн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е（О концепте контейнера и формах его объективации в языке）[J]. Известия АН，Се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языка，1999(5-6).

Кубрякова Е. С. Об установках когнитивной науки и актуальных проблемах когнитивн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и [J]. Известия РАН，Се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языка，2004(3).

Кун Т. Структура научных революций [M]. М.: Прогресс，1977.

Леонтьев А. А. Основы психолингвистики [M]. М.: Смысл，1997.

Маслова В. А.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в лингвистике [M]. М.: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Академия”，2008.

Нерознак В. П. Сумерки лингвистики. Из истори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языкознания: Антология [M]. М.: Academia，2001.

Павиленис Р. И. Проблема смысла [M]. М.: Мысль，1983.

Постовалова В. И. 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в свете антропологической парпдигмы [A]. Фразеология в контексте культуры [C]. М.: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1999.

Степанов Ю. С. В трехмерн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языка [M]. М.: Наука，1985.

Хомский Н. Аспекты теории синтаксиса [M]. М.: Изд-во МГУ，1972.

Фортунатов Ф. Ф. Избранные соченения. Т. 1 [M]. М.: Госучпедгиз，1956.

收稿日期: 2013-07-23　　**【责任编辑　李洪儒】**